**全球化视域中“跨国华人”的行为特征及认同取向**

刘 勇 蔡苏龙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思政部，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随着国际移民新群体的异常活跃与兴起，以及跨国主义理论的提出和流行。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跨国华人”（Transnational Chinese）这一新的理论命题。尽管目前我们对这一概念和新群体的具体形态特征的阐述还没有准确清晰的理解表达，但这个范畴的提出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基于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状况，本文试图从全球化的视角来探讨“跨国华人”的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着重考察和分析“跨国华人”的行为特征及认同取向，探讨“跨国华人”在面对祖籍国与移居国以及两者之间关系时所采取的各种经济和文化策略，揭示其本土化与跨国性的一些文化含义和活动规律，指出在全球化多重语境下“跨国华人”出现了认同的流离及转向。

关键词：全球化；跨国华人；行为特征；政治认同；文化认同

随着国际移民新群体的异常活跃与兴起，以及跨国主义理论的提出和流行。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跨国华人”（Transnational Chinese）这一新的理论范畴。尽管目前我们对这一概念的阐述以及这一新移民群体的具体形态特征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但是这个范畴的提出无疑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状况，本文试图从全球化的视角来探讨“跨国华人”的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着重考察和分析“跨国华人”的具体形态和行为特征及其认同取向。

一、全球化进程与“跨国华人”的行为特征

“全球化”的理论早期是以跨国经济或资本网络为准的“世界体系”、“网络社会”观，分别由瓦洛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卡斯德尔士(Manuel Castells)提出，由于这种观点往往限定于欧洲和北美、日本为G7会员所投射出的中心，以至于把其他世界纳入边缘，无形之中又强化了发展逻辑及现有的社会秩序，后来的学者纷纷呈现环球文化经济的差异及不均，出入两三个国家疆界的市民所形成的“远距民族主义”与其“不协都会文化观”，或者把全球化视作是理想与本土文化的辩证。认为各地区的消费及文化生产是将跨国的商品、资讯、风尚、生活方式等加以调用，重新赋予意义。不过，这些学者的讨论常常把全球化人口流动、漂泊的轴心放在北美，例如，克利佛德在他的《旅游/旅居》一书中，不断强调环球人口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的旅行、移动，因为其运行途径及其旅居与居住之间的轨道，逐渐产生其漂浮不定的文化属性，将“本地与外来”的二元对立予以瓦解，进而形成“比较”与不协的都会文化。然而，在论及全球人口流动的章节里，犹太人于德国、黑人于英国、墨西哥人美国始终是他的固定的坐标，虽在文中，也提到华人跨国主义及其研究与实践，但都以王爱华所分析的北美华人“富于弹性的分民身份”，且主要集中在旧金山为主，也就是将其视野放在“太平洋圈的资本主义”此一分析脉络上，而未论及其他地区的跨国华人。

王爱华（AihuaWang）则提出华人及亚裔美人跨太平洋所建立的“另类现代”，以弱势族群彼此提携的方式，相互协助，构成主流之外的经济、生活、文化、医疗网络，且以另一种不很明显的关系网络，凝聚象征资本与社会资本，形成所谓的“跨地区的华人帝国”，也就是跨国的华人贸易网络，这些华人或亚裔美人是持有一国或多国护照，出入于国家关口，虽说有其家庭分离和适应上的问题，但是只要“靠近机场”，便可充分发挥其“太空人”的“弹性公民权”，获得最大的利益。她在《弹性公民》（Flexible Citizenship）一开始便以香港人多拿外国护照（如英国或加拿大护照）为例，来说明港人借此准备在中国接管以前保留退路，“政治家及警察也和其他600万香港人没什么不同”，都有“多重护照”。她说在“政治不稳定”与“全球贸易动荡”时，大家无不热衷于以多重国籍来保财安身。其实也是“跨国华人”和资本在面对故国与寄居国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时所采用的各种经济和文化策略。她在书中更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华人在不少地区经商时，总是以弹性之作为，对各地的现实政治经济作重新调整，因此有所谓的“新亚洲政权”在“亚洲伦理”之下，继续发挥其“家庭罗曼史”式的资本与政治经济控制网络。因为经济和人力资本的流动，使对华人性（或译中国性，Chineseness）的解释受到了空前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作者指出这个词既指称一种根据民族国家地域界限所划分出来的道德实体，也可以象征一种涵盖超国界无疆域的道德经济力量。

新加坡国立大学刘宏博士的《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明确提出了“跨国华人”范畴。他把“跨国华人”定义为：那些在跨国活动的进程中，将其移居地同(自己的或父辈的)出生地联系起来，并维系起多重关系的移民群体。他们的社会场景是以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的界限为特征。他们的活动场景是以跨越地理、政治和文化的界限为特征，作为跨国移民，他们讲两种或更多的语言，在两个或更多的国家拥有直系亲属、社会网络和事业，持续的与经常性的跨界交往成为他们谋生的重要手段。现在“跨国华人”主要有三类：一是再次移民者：即一批从传统的华人移居地(东南亚)迁至发达国家的早期移民，这些移民在新旧移居地之间形成跨国网络；二、早期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因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而与大陆重新建立密切联系；三、近年来出现的新移民，包括专业技术移民、家庭团聚移民和非法移民。[[1]](#footnote-1)

因此,与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跨国华人”概念所应表达的内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跨国华人”指的是那些从事跨国活动，并在国内外维系起多重网络社会关系的华人群体。“适应世界性”、“频繁流动性”、“非固定性”、“跨区域合作”和“社交网络化”是其主要行为特征。大致可以分为国内和国外二大分支：一是传统的海外华人的再移民群体；再是中国国内的新移民群体。既包括传统的海外华人的再移民群体，也包括新移民、未办理移民手续但长期从事跨国活动和经营海外事业的中国人，如海外投资人员；海外留学人员；出境多国旅游人员；准备出国留学、新移民等。除此之外，那些身在国内，但在跨国公司谋有职业和职位，有的还持有海外长期居留证的人，以及有的长期为跨国公司做代理，或者和国外公司合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和国外公司互相参股的，是否也可称之为“跨国华人”？应该注意到，他们在经济收入和生活方式上已与一般的国民不同。更本质的是，他们的利益是和世界资本而不是本土资本联系在一起。因而有的学者称之为“跨国民族中产阶级”，这些人也被称为新兴的“跨国民族中产阶级”。[[2]](#footnote-2)除了刘宏提出的三类“跨国华人”，其实“跨国华人”还包括：一是那些身在国内，但是在跨国公司占有较高管理职位，有的还持有海外长期居留证的人；二是那些长期为跨国公司做代理，或者和国外公司合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和国外公司互相参股的人；三是出国留学人员、海外投资客、出境旅游人员等。他们在经济收入、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上显然和一般的国民不同。更本质的是，他们的利益是和世界资本而不是本土资本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全球化渗入到本土社会的关键媒体，但他们又有民族性的一面和限度。

我们看到的“哑铃模式”(即华人在中国和海外都有多项事业)，“飞鸟模式”(即在全球多处的事业之间来回穿行)，“风筝模式”(在多个国家发展事业的同时还和国内保持联系)等等，都是“跨国华人”的具体行为表现，“经贸活动”、“跨国投资”是其主要行为目标的指向和旨趣。他们的行为关系表征为身在“这里”（居住国），却对“那里”（祖籍国）表现出特有的关注，属于“既在这里，也在那里”，具有超越现实和想象空间的综合能力，其行为关系连接起居住国和祖籍国双方的跨身份的一个社群。中国政府将原来针对留学生的“回国服务”的提法改为“为国服务”，并推出“春晖计划”，支持“长江计划”以鼓励科技华人短期回国交流，同时又保持他们在海外事业的发展，也与“跨国华人”的行为逻辑相一致。当然“跨国华人”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终身“跨国”流动下去，有人到了一定阶段可能回归到“叶落归根”和“落地生根”的旧有模式中去，但是新移民也将不断加入到“跨国华人”的行列中来，使之形成一种游移中的常态。但是跨国性的“华商” 和“华工”移民模式依旧是其主要形态。

“跨国华人”的概念是和“中国的全球化”紧密相联。全球化不是单维的全球一体化的过程，而应该被理解为不同的文化特别是不同的市场、不同的产业等经济要素在全球舞台上的相互竞争和博弈。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启动，和国际开始接轨的时候，当时在以西方为主体的世界舞台上扮演的是相对边缘的角色，而从1990年代以来，特别是加入WTO后，随着中国和世界空前紧密的融合，中国逐渐采取了“以我为主”的主动姿态和策略。浙江人和福建人在全球性流动策略，则是“中国的全球化”的一个生动体现，同时中国政府改变了原有的传统民族国家观，代之的是跨国主义要旨和策略。对这些新移民的态度和政策也是加入了“中国的全球化”的元素：国家政府和新移民塑造而成的新型关系将使得它对资本、市场、物品和信息的全球流动有更好的把握。所以，社会的跨国性对国家并不总是坏事，如果国家能够及时调整其功能和手段，就可以借助跨国的情势来迅速发展壮大自己，以更主动的和强大的姿态融入全球化的进程。

“跨国华人”的出现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跨国华人”形态其实说起来也是新一波强大的华人跨国移民运动，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的国内跨省和跨地区移民以及海外移民浪潮下，向海外移民的再一次拓展和延伸。不过，这一波新移民似乎比改革开放初期的被动移民来得更有动力和更加凶猛。“跨国华人”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新的华人移民形态，或者说一种新的国际移民类型。它的全球性和频繁流动性特征尤其更加值得关注。在与“跨国华人”相联系的能力和功能作用问题上，应该看到，在现阶段，真正有能量的“跨国华人”还不是很多，但是他们代表着中国国际市场的水准，拥有宽广的跨国社会网络，是在全球化进程中新崛起的一个群体。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华商网络的构建和中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实施，可以预见，在全球化所建构的当代语境中，“跨国华人”这一新群像的功能将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更加充分的发挥。

二、多重语境下“跨国华人”认同的流离及转向

只有当全球化想象由水平到垂直、由垂直扩展到动态网络时，我们才可能进一步来探讨“跨国华人”认同的流离及转向。“跨国华人”在其形成过程中的“非地域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认同的指向。所谓非地域性，是指在全球化过程中，生产、消费、政治、群体和认同逐渐与地方分离的一种趋势。[[3]](#footnote-3)对于“跨国华人”而言，地域的意义不象传统移民那样显得重要和不可或缺；民族国家更多的只是一种政治主权的象征，经济、社会、文化的机会与发展空间对他们显得更具有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领土与地域就是建构在自身活动的空间之中。这种非地域性本身就是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再是跨国华人的多维活动空间与多元性，也深刻地影响了其同中国的关系。近年来，由于一系列的因素（如西方经济衰退，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等），留学生回国数量日增，出现了所谓的“海归派”。[[4]](#footnote-4)不过，也要注意到不少的回国者他们仍然与海外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而并不是象过去那样的“落叶归根”或被迫“斩草除根”。

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看，跨国华人既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重要载体和媒介，也是超越东西方文化“第三文化”的建构者。近年来，随着跨国华人群体的形成与发展壮大，更多的以其为对象的华文大众传媒也日益增多。据调查，在聚居40万人的加拿大温哥华地区，其中74%的华侨华人有阅读中文报刊的习惯，而收听收看中文电台或电视台的华侨华人比例为61%和64%。另据统计，目前加拿大大约有30家左右的华文报纸，其中70%以上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创办和经营。[[5]](#footnote-5)所有这些中文媒体平台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 “文化中国”的内涵与外延，并建构和维系了一个没有边界的“想象的共同体”。

“跨国华人”是一个不停地游离于全球的多种文化之间交流对话的新华人移民群体。他们既认知中华文化的要义与旨趣，也熟悉西方文化的精髓，作为跨越多重地理与文化边界的群体，他们常常显得更具创造性。近年来，在美国崭露头角的吴宇森、陈冲、谭盾等，就是生动的案例。高行健以中文写作，但是法语文化的氛围无疑对其创作风格和艺术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出生于印尼、移民于荷兰、任教于澳大利亚的华裔学者Ien Ang写道：“我的个人经历促使我既不完全认同亚洲，也不全盘接受西方。”因此她的写作与研究的出发点是“这种掺杂的观点——含糊不清的既不/也不或既是这/又是那”。[[6]](#footnote-6)一个在澳洲留学三年并到过香港、东京等地的17岁北京学生表示，她走的地方多了，世界观也变了，“我现在已经不会在中国和澳洲两种文化中挣扎。每到一个地方，接触不同的文化，不是一种排斥心理，而是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收。”[[7]](#footnote-7)这种第三文化还未塑造定型，它与19世纪晚期产生于东南亚的土生华人文化虽然同属于“杂糅文化”，但它的确更具创造性和生命力，因为它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多元文化碰撞和互动的结果，而非地域性文化交流协调的产物。

“跨国华人”在文化上和心态心理上具有明显的跨国性和超越地域性，它与土生华人在认知和观念上明显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因素的差异，这种也差异折射出多种不同的认同取向。从土生华人以及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认同主要是一种政治选择并与固定的地理概念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希望，他们（新移民）将对这里产生归属感。因为我们的祖辈也都是移民，但落地生根，我们已把新加坡视为我们唯一的家”。[[8]](#footnote-8)然而，从新移民或跨国华人的角度来看，“家这个概念在他们理解好像是和人有关，而没有将它和地域特别地联系在一起”。[[9]](#footnote-9)认同可以是多重而并行不悖的，而地域也更多的成为一种流动的概念。

“跨国华人”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移民，一方面它自觉或不自觉地挑战民族国家的权威；同时又要看到它有认同民族国家的一面，它一直在与民族国家相协调和互动中不断地壮大自身的力量。全球化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离乡不背井、落地不生根，可以人在美国坐，家乡从电视和网络中来。后殖民离散（diaspora）造成上层精英与下层劳工的跨国流动，而所有文化视听影象也同步跨国流动，任何单一地点可轻易转变为虚拟空间，他方不再是异国。全球化流动与后殖民离散（diaspora）更进一步造成返乡潮的可能，尤其是当所谓的家乡越来越现代化、民主化与资本化时，返乡观光、返乡投资、返乡参政和返乡讲学。全球化的“空中飞人”使“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中单一疆域概念变得很不清晰，国土成为可以自由转换、快速出入的空间，也同时让单一对象的民族国家认同与效忠变得无可适从。

20世纪70年代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主张，将华裔—美国人（Chinese—American）中的连接短线删除。这个连接号让身为华裔美国人的她左右为难，一边是中国人，一边是美国人，十分精神分裂。而拿走连接号之后，华裔就降一格变成形容词，以凸显作为名词、单一确定主体的美国人。汤亭亭发言的年代，正是美国少数族裔企图声明他们作为“典型美国人”的合法性，而非半个美国人或骑墙派美国人。但当代的美国少数族裔论述，却是越来越强调亚裔—美国人、非裔—美国人、印度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中连接号产生的张力，此次是右边的美国国家认同，越来越拉不住左边随时要流动、要返乡、要全球漫游的流离认同。甚至有人已开始主客易位的形容词—名词组合：美国籍中国人、美国籍中国人、美国籍波多黎各人、美国籍新加坡人。而目前美国学院内美国文学研究“脱美入亚”的倾向，当是最佳例证。[[10]](#footnote-10)从上述可以看出，在全球化和“去领土化”的背景下，华人的跨国流动行为也使得“落叶归根”、“落地生根”的传统模式变得似乎没有太多意义，认同一直是伴随着华人跨国的过程中位置和功能的变化而改变的，原来一致认可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也将发生流离和转向。

三、结语

“跨国华人”概念的提出为我们提供了在华侨华人和国际移民分析中的新路径，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中，从保证特定华侨华人的话语中，分离出具有自身价值的“跨国华人”概念是有意义的。民族性、本土性和歧视可以抑制其发展，也会否认其作用和效果。但是从全球视野和能力角度观察跨国华人，将使人们集中关注全球性、跨国主义理论和跨国华人，以此作为经济行动资源的方式和策略。所以我们应该把它与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下的跨国性和定义关系结合起来考察，因而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新概念和新的理论范畴。

华侨自产生以来，其情结似乎都与民族国家以及领土或地域性密不可分。这种地域性可以包括民族国家，也可以涵盖海外华人的祖籍地侨乡。近年来，侨史学界争论不休的华侨称谓问题，实质上强调的是海外华人与政治上的国家疆界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与此同时，从“中国文化持续论”、“同化论”、“融合论”、“认同论”到强调本土文化的脉络的几种理论思潮，其所关注的根本问题始终是海外华人如何在侨居国落地生根，建立起新的、以民族国家为对象的政治效忠和文化认同。

全球化时代也是民族主义者复苏的时代，表现在对既有的民族国家的挑战及各地以民族性为基础的认同的重构。[[11]](#footnote-11)这也使当今我们所看到的华人跨国主义运动具有与近年来广泛出现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主义商业运动不同的特质。从这个角度理解，今天的华人跨国主义社区(transnational ChineseNetworks)的出现，也是对共同历史的一种追忆形式。但是，我们不应简单地在理解民族主义的框架里来解释这种现象。事实上，这类社团或活动的出现并不一定能反映参与者对中国文化或传统的认同程度，更谈不上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作为全球化的副产品，跨国主义更多地与资本的全球性流动有关。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跨国主义的敌人恰恰是民族主义，因为时至今日，资本已经全面地突破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大部分国家都出现了吉登斯和亨廷顿所说的程度不等的主权缺失现象。美国的许多公司就雇用了大量国外的产品推销员，印度人不出国门同美国的顾客通话，提供售后服务指南、解释产品性能。根据对23位西方跨国企业和所谓非盈利国际组织老总的调查，至少在美国，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商界精英自视为“世界公民”。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说过大致如下的话：一个拥有地产的人可以是某个国家的公民，因为他的财产附在某个特定国家的土地上；当一个人的财产是股票时，他就可能是世界公民，因为他的财产并不一定需要依附于某个国家。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华人实际上主宰了所在国的经济命脉，也出现了跨国资本，经济全球化与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然而，在全球化市场的争夺中，他们需要同来自西方国家的强大商业势力竞争，于是，跨国主义的华人认同应运而生。在异国他乡相似的历史遭遇使他们形成了跨国社区、社团，中华认同──无论它是历史的、国家的、文化的，遂成为一种象征和社会资本，在社区的整合中发挥了它的凝聚力。 [[12]](#footnote-12)在全球化的多重语境下，我们应当充分地认识到跨国华人多重认同的重要性，这一方面要以为他们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和重要的公共空间，取得与当地公民并生共存的位置。另一方面，他们又敏锐地感受到外部社会的异化和边缘化问题，根据自己的理解，它感受到独立身份的威胁，既竭力维护自身的生存，又试图构建出适应变动的社会环境。认同的多重性其实基本上还是环境所致。

多内涵是全球化的标志，社会因素的相互关联性，变快的生活节奏，开阔的视野，少数幸运儿的世界主义是多元现代性的一方面。全球化也是一种无中心的状况，正如齐格蒙·鲍曼所说，迫使人们不时地构建新身份来适应一种“流动的现代性”。在多种族、跨国界的互动中，同时也产生了全球化时代的认同困境。从本土情结与中国中心观的视角来审视，应该不同于，并需要从根本上同，只能从层面和意义上来理解，它意味着对外来的一切从社会体制、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都从自己特定的立场和观点来进行选择和解读。必然体现出其内在的视域，这一视域决定着“跨国华人”认同的分合流离及转向。

作者简介：

刘勇，1977年2月生，男，内蒙古巴彦淖尔人，历史学博士，讲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思政部，主要从事中国移民史研究。通讯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邮编：312000。联系电话：13065586616 邮箱：[lsc-751221@126.com](mailto:hetao2000liu@163.com)

蔡苏龙，1969年12月生，男，湖南永州人，历史学博士，副教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主要从事华侨华人与侨乡社会研究。联系电话：17858111229 邮箱：3076424549@qq.com

参考文献

1. [新加坡]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5页。 [↑](#footnote-ref-1)
2. 项飙：跨国华人，2004年第5期，第7页。 [↑](#footnote-ref-2)
3. [美]Michael Kearney：The Local and the Global:The Anthropology of Glob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ism．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95年，第302－338页。 [↑](#footnote-ref-3)
4. 汪祥荣，王红蕾：归来之后——与七位“海归派”人物面对面，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footnote-ref-4)
5. 屈桂琴：风生水起的加拿大华文传媒，吕伟雄：海外华人社会的新观察，岭南美术出版社，200年，第119－120页。 [↑](#footnote-ref-5)
6. [美]Ien Ang：On Not Speaking Chinese: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年，第8页。 [↑](#footnote-ref-6)
7. 留澳学生直言：根在北京，我不会做“香蕉人”，北京：环球时报，2002年4月25日。 [↑](#footnote-ref-7)
8. 社论：以积极态度对待新移民，新加坡：联合早报，1997年4月5日。 [↑](#footnote-ref-8)
9. 张敬贤：当代新移民的个案探讨：专业人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班“海外华人专题”课程的研究报告，2002年，第10页。 [↑](#footnote-ref-9)
10. 张小虹：天上飞的与地上爬的：911事件的文化思考，全球化与文明对话，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38页。 [↑](#footnote-ref-10)
11. [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9页。 [↑](#footnote-ref-11)
12. 范可：“社会创伤”、华人认同、华人跨国主义，读书，2005年第1期，第47-52页。

    Transnational Chines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 behaviour feature and the change of his identity

    LiuYong CAI Su-long

    **Abstracts:** Based on the academic study of the China and Foreign, this paper mainly makes a general analysis upo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Transnational Chinese, It points out that the politic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Transnational Chines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re changing .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Transnational Chinese, the behaviour feature, political identity , cultural identity [↑](#footnote-ref-12)